

抗戰期間國共的妥協、衝突與爭議評析

The Analysis of Compromise,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between KMT and the Communis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賴世上 上校 (Shi-Shan, Lai)

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主任教官

提 要

- 一、在「國共」分合歷史中，對日抗戰前後的衝突、妥協、再衝突的過程，不僅轉折的時間短、變化的幅度大，使抗戰期間國共妥協與衝突的歷史，成為「國共關係史」研究的核心。
- 二、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納編中共參與抗戰，然由於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堅持「獨立自主」，並在敵後地區擴張實力；國民政府為統一政令、軍令，國共雙方由妥協合作轉變為摩擦衝突。
- 三、由於國共摩擦衝突層出不窮，國民政府遂於民國29年7月，擬制「中央提示案」，要求中共全部到黃河以北地區，其中「新四軍」除未遵令前往外，並襲擊國軍部隊，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乃下令將叛軍降服解散、取消該軍番號。「新四軍事件」（中共稱「皖南事變」）後，中共刻意製造國內外輿論壓力，國民政府卻只能低調回應，而中共則從軍事實力擴充，朝外交影響力發展。
- 四、中共是以共產革命的觀點看待抗日戰爭，強調的是階級利益；而國民黨雖曾力圖制壓中共坐大，但身為執政黨終究必須承擔民族存亡歷史責任。

關鍵詞：國共關係、妥協與衝突、新四軍事件

Abstract

1. In the history of KMT and Communist, the compromise,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process of conflict make change a short time, but the magnitude of change is huge. It makes compromise and conflict between KMT and Communist become the core study of the history in KMT and Communist.
2. The year of 1937, the KMT government made the Communist involving the war, then as Mao Ze-dong and other Communist leaders insist on "independence", For unified national government decree and military orders, the KMT and Communist turned compromise into conflict.
3. As endless conflict between KMT and Communist, the KMT government drew the "central prompt case" in July 1940, asking all Communist moved to the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but "the New Fourth Army" did not obey the order , and attacked the KMT troop, the commander Gu zhu Tong order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rebels and put the military into designation. After "the New Fourth Army event", the CPC deliberately created by public opinion at domestics and abroa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only a little response, and the PRC expanded military power, diplomatic influence into further development.

4. The Communist treated the Sino-Japanese War by communism revolution, emphasizing the Class interests, though the KMT trying to pressure the Communist, but ultimately the ruling party have to bea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survival.

Keywords: The relation between KMT and the Communist, compromise and conflict, the New Fourth Army event

壹、前言

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卷首語揭示了「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¹的政治循環。以此檢證過去的「國共關係」，乃至於觀察現在「兩岸關係」，形式上似乎也是依此循環模式演進發展，不同的是分合時間長短與分合程度疏密。在「國共」分合歷史中，對日抗戰前後的衝突、妥協、再衝突的過程，不僅轉折的時間短、變化的幅度大，而且隨著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連結，所涉及的層面更廣，使抗戰期間國共妥協與衝突的歷史，成為「國共關係研究」的核心。然因海峽兩岸意識形態與衝突對峙，使這一段歷史研究除了史料獲得限制因素外，更長期受到政治與宣傳干擾。

抗戰前後國共的妥協與衝突，基本上是屬於政治性的權力與利益的互動關係，從「政治妥協」的觀點來看，它是兩個革命性的

政黨或政治集團之間「在利益衝突時，衝突雙方通過政治談判、協商或默契，互相做出讓步，以緩解矛盾的一種行為。」²對國民政府而言，妥協是迫於抗日救國，衝突則是導因於中共獨立坐大；對中共而言，妥協是結合抗日民意與生存發展需要的選擇，衝突則是來自於國民政府對其獨立發展的限制，雙方雖有抗日的共同目標，然卻因各自的立場主張與利益，並隨著戰爭範圍擴大與國際勢力介入，使得衝突加劇。本文從公布之文獻、檔案，同時參考學者相關研究，力求客觀陳述此一歷史過程，並評析國共摩擦衝突的爭議。

有關抗日戰爭時期界定，海峽兩岸慣以民國26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為起點，到民國34年日本投降為止，通稱為「八年抗戰」。³本文論述中共參與抗戰是以民國26年全面抗戰後，中共軍隊納編國軍抗日作戰序列後為主，而納編前國共的衝突、妥協過程則以

1 羅貫中（明），《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月，2版2刷），頁1。

2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臺北：錦繡文化事業，1993年8月），頁503。

3 王檉林，〈論『十五年中日戰爭』與『八年抗戰』〉，《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1期（2009年2月），頁20～25。

歷史背景概述之。

貳、國共衝突與妥協的歷史背景

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Toynbee)說：「歷史不僅是過去，歷史也向所有的方向延伸。歷史學家的領域是時間的全程；它的理想是貫通過去、現在與未來，而使其成為一個有機的連續體。」⁴對國民政府而言「納共抗日」是重要決策；中共而言，參與抗戰既是黨內重大決策，也是國共關係歷史中的重要發展過程，任何一項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形成必然受其所處環境因素的影響。

一、國民政府圍剿壓力與「容共抗日」的轉變

中華民國肇建之初，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列強侵凌，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創立真正的革命武力、統一中國，於民國12年1月在上海與蘇聯代表越飛(Adolf A. Joffe)發表《孫越聯合宣言》，⁵開始推動「聯俄容共」政策，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形成民國13年到16年間「第一次國共合作」。然由於國民黨內部對「容共政策」欠缺共識，當時黨內精英如「汪精衛、廖仲愷及其他親共

的國民黨員，積極爭取共產黨效力國民黨；胡漢民、戴季陶及其他反共的國民黨員，則竭力防止共產黨破壞國民黨。」⁶共產黨雖以個別黨員名義加入國民黨，然而卻極力保持黨組織的獨立性，使「容共政策」給了共產黨發展的機會，卻也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矛盾與鬥爭，最後於民國16年4月演變成「清黨」與「寧漢分裂」。中共則開始藉由工運與農運在各地展開「武裝暴動」（中共稱「武裝革命」或「武裝起義」）。根據統計「自民國16年8月至民國18年12月，兩年多中，中共在各地策動的重要暴動近30次，遍及江西、湖南、廣東、湖北、福建、江蘇、四川、安徽、廣西、河南、陝西等11省。」⁷另中共學者楊奎松研究：「中共從1927（民16）年8月以後，接連在各地發動了上百起武裝暴動。」⁸國民政府遂於民國19年11月「中原大戰」結束後，⁹至民國25年12月「西安事變」止，共進行了5次武裝圍剿，其中民國23年10月第5次成功圍剿行動，迫使中共長達一年的流竄（中共稱「長征」），到了民國24年下半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紅軍逃抵陝北與徐東海領導的當地共黨會合，當時川康與陝甘邊境的

4 轉引自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8年），頁28。

5 郭廷以主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頁70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頁20。

6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3月），頁162。

7 教育部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第八章）》（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79年1月），頁1367～137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61～73。

8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月），頁274。

9 民國17年東北易幟，形式上統一全國，但各地軍閥勢力仍然存在，加上全國軍費超過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國民政府於乃於民國18年1月召開「國軍編遣會議」，期降低軍費支出，並藉機解除地方軍閥派系勢力；民國18年3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黃紹竑先與中央決裂，爆發「蔣桂戰爭」，續於民國19年5月中央軍又與馮玉祥、閻錫山西北軍交戰，戰事延續至9月，在張學良的東北軍支持中央軍的情勢下，閻錫山、馮玉祥通電下野，結束這場北伐成功後的另一場內戰。參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4月），頁422、441、452、459、500；張玉法，前揭書，頁223～232。

中共紅軍總數僅剩2萬餘人，¹⁰蔣委員長在日記中寫道：「今後中心工作為剿匪，可說已達到七分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對匪僅著力於清剿可也。」¹¹可見蔣委員長也意識到，中共紅軍並非入侵之外敵，所以短期內無法完全剿滅殘匪，必須併用政治、軍事手段尋求解決之，而瀕臨被剿滅的中共一方面雖高喊「抗日反蔣」口號，但另一方面則默許「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呂振羽與國民政府曾養甫（曾為陳立夫舊屬，時任鐵道部部長）試探性接觸，並由地下黨員董健吾、張子華穿梭於國共間接觸與聯繫。」¹²及至民國25年8月25日發出《致中國國民黨書》，不僅改變以往謾罵式「反蔣口號」，甚至尊稱蔣介石先生為蔣委員長，同時提出「國共重新合作」的呼籲，同年9月1日周恩來致函國民政府要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遊說「聯共抗日」，並敦促展開談判。¹³由此可知，中共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政策的轉變不僅時間短，而且變化幅度大，除顯示中共統戰的靈活性外，亦展現高度的策略性效果。

二、日本侵華日益猖獗與「抗日風潮」的連結

日本自西元1894年「甲午戰爭」與1905年的「日俄戰爭」後，即將滿蒙劃為勢力範圍，除建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外，並以護路為由組建駐軍在奉天、旅順、長春等鐵路沿線。民國成立後，東北地區逐漸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控制，民國17年張作霖乘坐的火車遭日本軍爆破，將他炸死（史稱「皇姑屯事件」），¹⁴間接促成東北易幟與中國形式上的統一；日本軍閥為加速解決「滿蒙問題」，乃於民國20年9月18日發動「瀋陽事變」（即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在「安內攘外」政策下，並未組織大規模抵抗，到了民國21年3月整個東北幾乎全部淪陷。事變發生初期，國民政府一方面透過外交途徑向日本抗議、電令駐外代表向國際間宣布、訴請國際聯盟仲裁約制外；另一方面呼籲國人「團結、沉著、刻苦」，同時「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¹⁵惟4個月後（民國21年）日本又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國軍第19軍（蔣光鼐、蔡廷鍇）與後來增援的第5軍（張治中）展開抵抗，經過3個月激戰，最後在5月5日經英、美、法、

10 據川康剿匪將領劉文輝回報，川康紅軍已經剩下1萬5千人左右，而執行陝甘剿匪任務的51軍軍長于學忠亦回報，北上之毛、彭紅軍僅餘6個團，……總共不過三、四千人。引自國史館藏，〈劉文輝等致蔣委員長電〉，《蔣中正檔案》，民國24年11月23日；特交文電24031307；國史館藏，〈于學忠致蔣委員長電〉，《蔣中正檔案》，民國24年9月30日，特交文電24022390。

11 轉引自楊奎松，前揭書，頁131。

12 關中，《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美國與國共談判真相1937~1947》（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86。

13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6月），頁193~19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頁325。

14 半藤一利著、林錚顥譯，《昭和史（上）》（臺北：玉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頁38。

15 郭廷以主編，前揭書（第三冊），頁79~82；〈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同胞書〉、〈國民政府告全國同胞書〉，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0年9月初版），頁284、287。

義等國調停下，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再過7個多月（即民國22年1月1日），日軍又揮兵進攻山海關、進逼熱河，並與國軍在長城的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天門等地激戰，國軍且戰且退，政府則持續交涉，最後東京參謀本部在「迫和為主」的原則下發布「華北應急處理方案」，並經由國民政府臨時設立之「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的交涉協調下，於5月31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¹⁶軍事行動雖暫時停止，但以其他手段的侵華行動並未稍歇。根據當時駐日大使蔣作賓報告指稱：日本「欲在北方組織一反中央勢力，先以冀、晉、察、綏、魯為範圍，俾與中央脫離，…，並欲利用閻主任為傀儡云云。此計若成，無異第二偽國，…」¹⁷事實上，日軍持續採取製造糾紛事端、增兵脅迫、經濟干涉等手段，企圖讓華北脫離中央管轄，其中《秦土協定》、¹⁸《何梅協

定》¹⁹的產生，就是讓冀、察兩省特殊化具體事證。隨著日軍侵華事件日益加劇，為降低中國反日風潮，日本於民國24年8月10日向中國提出包括：「徹底取締排日，拋棄依賴歐美的政策；正式承認滿州，否則應作事實默認；日本、滿洲與中國共同防止來自外蒙的赤化。」²⁰之3項要求。此即所謂「廣田三原則」，也是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3（民國22）年至1936（民國25）年間對中國的外交策略。」²¹矛盾的是日本對華的侵侮行徑日益蠻橫，卻要求中國不准排日，國民政府在「安內攘外」的政策下，被迫下達「嚴禁反日運動」與「睦鄰敦交令」，²²並疏導、取締各地激烈抗日請願示威行動。國內學者張玉法認為：「抗日風潮激化反政府行動，是指有些黨派及民間勢力，甚至包括國民黨內部人士藉口政府不抗日，反抗國民政府，所作的遊行示威和軍事行動。」²³對於

16 郭廷以主編，前揭書（第三冊），頁219～270之相關記載。另參閱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民國62年5月出版），頁130～138。

17 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693～694。

18 民國24年6月5日4員無護照日本軍人由多倫往張家口，途經張北縣被駐軍拘留詢問。日方以受到「恐嚇」為藉口，要求「懲辦直接負責人」，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之職，由秦德純代理，並於6月27日，由秦德純與日方代表土肥原賢二在北平簽署處理協定，稱為《秦土協定》。其主要內容略以：(1)駐於昌平和延慶一線的宋哲元部隊，調至其西南地區；(2)解散排日機構；(3)處罰張北事件負責人；(4)制止山東移民通過察哈爾省；(5)從日本招聘軍事及政治顧問；(6)援助日本特務機關在內蒙的活動等。郭廷以，前揭書（第三冊），頁475、482、485；另參閱吳相湘，前揭書（上冊），頁199～202。

19 民國24年5月29日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武官高橋坦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1)撤換湖北省主席于學忠，省府移保定；(2)撤換天津市長、公安局長與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3)撤退北平黨部組織等。針對酒井隆等提出之要求，經何應欽代理委員長多次協調後，請示當時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應允，並致函梅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此次中日雙方交涉，並未簽訂文書協定，故又稱「梅何默契」。詳見張玉法，前揭書，頁261～262。

20 引自郭廷以，前揭書（第三冊），頁498；吳相湘，前揭書（上冊），頁207。中日交涉經過詳見秦孝儀主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頁640～646。

21 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3年11月），頁90。

22 吳相湘，前揭書（上冊），頁192；郭廷以，前揭書（第三冊），頁446、478。

23 張玉法，前揭書，頁280～299。

瀕遭剿滅的中共得以順勢利用抗日民氣，連結反蔣、反政府的輿論力量，不僅影響國民黨黨內的團結共識，同時使得各地軍隊逐漸喪失對「剿共」作戰正當性的認識。

三、共產國際策略指導與「兵運策反」的奏功

民國16年12月11日中共在共產國際副代表紐曼愛斯拉(Heinz Newmam Gerhart Eisler)的指導與協助下，發起「廣州暴動」，國民政府旋於12月14日明令對俄絕交，撤銷各地俄國領事館，²⁴自此共產國際對中共轉為秘密指導與支持。民國24年7、8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代表王明在會中提出《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報告，根據此一報告王明以中共中央與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在莫斯科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籲停止內戰、聯蔣抗日，並提出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主張。²⁵中共根據共產國際傳達的決議與《八一宣言》的內容，於12月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除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外，並強調「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²⁶可見王明

等「中共國際派」代表與「陝北中央毛派」在「聯蔣」與「反蔣」立場明顯不同。不過中共最後仍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妥協「反蔣」立場。根據大陸學者楊奎松的研究，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y Mikhailovich Dimitrov)曾在執委會會議中，批評中共「將『抗日』與『反蔣』並舉是錯誤的」，甚至建議「以『民主共和國』的國號，取代『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國號。」²⁷到了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指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必須停止紅軍與國軍間的軍事行動，而且正式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就停戰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定進行談判。」²⁸顯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統一戰線」的指導更趨積極。此外，中共為加強華北白區工作需要，於瓦窯堡會議同時決定成立「白軍工作委員會」，除已派潘漢年至港、滬南方工作外，增派劉少奇至平津，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另由周恩來、葉劍英組織「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積極進行統戰策反工作。²⁹此其間各地的學運、工運、兵運，乃至於後來「西安事變」都與這些統戰機構脫離不了關係。

參、抗戰期間國共合作與衝突

24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8年11月，第6版），頁44；郭廷以，前揭書（第二冊），頁296～297。

25 王邦佐主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頁178～181。

2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0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年），頁604。

27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3月），頁307～311。

28 同註27，頁317～320。

29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臺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民國71年10月，第4版），頁112～1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頁301。

民國25年12月12日發生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國民政府迅即進行危機處理，³⁰使事件得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蘇區與紅軍接受改制、改編。正當國共高層準備在廬山進行再談判之際，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國民政府必須集中全力應付日軍擴大挑釁的變局，最後中共終於取得國民政府的妥協與讓步，除保留3個師級單位外，並成立獨立的指揮機構（即八路軍，正式銜稱為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改編完成後，即奉命開赴晉東北，其中115師奉命截擊了日軍補給部隊，雖在中共刻意宣傳下，成了中共抗日代表作「平型關大捷」，³¹但也證明抗戰初期，八路軍確實接受指揮參與抗戰，然而隨著戰事持續擴大與毛澤東力主之「獨立自主游擊戰」方針確立，國共雙方摩擦漸起；民國29年初「新四軍事件」後，中共發出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時局」指示等文件，除宣揚抗日主張與實力擴張成效外，並總結強調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對立統一與暨聯合又鬥爭的策略發展。³²同年6月歐洲戰場上德蘇戰爭

爆發，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使得中國對日抗戰與第二次世界直接連結，也讓美蘇等國際勢力直接或間接捲入國共衝突與妥協調處，然就整體發展而言，國共矛盾衝突逐漸深化，雙方的實力消長也隨著衝突、斡旋及談判的過程發展產生重大的變化。

一、從軍事合作到摩擦衝突的過程

國共雙方在全面抗戰的大環境下完成形式上合作關係，初期這種合作關係主要表現在軍事上的合作禦敵，但由於雙方各自認知與立場不同，出現的軍事合作也大多只是軍事將領間的互動與作戰意見交換，而中共力圖發展與國民政府政治防範，反而成為雙方較勁主軸。

（一）在軍事合作方面

改編後的共軍（18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受山西閻錫山指揮；江南新四軍編入第三戰區第，受顧祝同指揮，18集團軍部分參加了「平型關戰鬥」與「忻口戰役」，³³以及民國29年8至12月中共宣稱的「百團大戰」，³⁴都被中共認為是抗戰時期國共軍事

30 有關國民政府危機處理情形，詳見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民國70年8月），頁181～190。

31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民國95年3月，頁131～186。

3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0次印刷），頁778～786。

33 忻口是晉北要地，民國26年9月底日軍大舉進攻山西，蔣委員長於10月2日命令第一戰區的第14集團軍衛立煌率3個軍增援太原以北地區，衛立煌部隊集中在忻口附近，會同第二戰區部隊編成3個兵團與日軍在忻口發生激戰，雙方持續增加兵力，戰事持續到11月8日太原失守。由於八路軍120師也納入左翼軍作戰序列，且部分參與敵後襲擾任務，所以被中共認為是抗日戰爭初期國共軍事合作典範；由於這場戰役是太原保衛戰的主要戰役，所以有些戰史稱「太原會戰」，而「平型關戰鬥」就是「太原會戰」的前哨戰。參見林延芝、劉永洪，〈忻口戰役：國共聯手抗戰的經典範例〉，《環球軍事》，第153期，2009年3月，頁54～56。劉鳳瀚，〈論太原會戰及其出其戰鬥—平型關作戰〉，《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6年7月），頁263～316。

34 中共八路軍在民國29年8月至民國30年1月間，發動的以破壞華北日軍佔領的交通線、礦山為目的的大規模破襲作戰。中共宣稱「戰役發起第3天參戰部隊已達105團，故稱百團大戰。」但根據國內學者劉鳳翰研究

合作的典範；此外，在民眾武裝籌建方面，「在閻錫山允許下，中共黨員薄一波在山西成立『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及決死隊（後改編為新軍）；在第五戰區與湖北省府同意下，中共黨員陶鑄等成立『豫鄂邊抗敵工作委員會』；在國軍廖磊部合作下，中共黨員方毅等人組織『鄂東抗日挺進隊』；在豫南中共黨員朱大鵬組織『抗日武裝挺進隊』」，³⁵只是這些民間武裝後來都被中共赤化，雙方為互爭地盤勢力造成摩擦與衝突。例如閻錫山發現共黨赤化山西「新軍」，乃對其進行改組、改編，³⁶然中共認為「山西新軍在建制上屬於閻錫山軍隊系統，……實際上是一支由共產黨人領導作用的人民武裝。」³⁷類似這種認知差距與實力較勁，摩擦衝突也就無可避免了。

（二）坐大與衝突方面

首先，在發展坐大方面，中共在民國26年8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決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³⁸根據中共官方出版的《抗日戰史》指稱：「在上海、太原失守後，八路軍分散兵力，由115

師成立了晉察冀軍區與邊區政府，120師建立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與臨時區黨委，129師建立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另外新四軍也開闢了以茅山為中心蘇南抗日根據地，到了1940（民國29）年兩支軍隊人數已從1937（民國26）年9萬2千人，成長到50萬人。」³⁹在大敵當前下，對於這支不遵號令、獨自專擅、別有圖謀的組織，國民黨在民國27年3月「第五屆五中全會」後，陸續密頒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理辦法最高原則〉、〈共黨問題處理辦法〉等多項措施，⁴⁰試圖以積極性的控制導引學生、民眾與團體，及消極性的查禁取締方式限制共產蔓延與擴軍，這些「限共防共」措施一方面提供國民政府反共人士的行動依據，另一方面也造成擴大摩擦與衝突的原因。其次，在摩擦與衝突方面，中共史學家將民國28年至29年之間國民政府與中共在山西、河北的衝突稱為「第一次反共高潮」，視民國30年的皖南「新四軍事件」為「第二次反共高潮」，並宣稱「這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隊調往敵後與共軍搞摩擦的部隊190萬人，製造的摩擦事件2,900餘起。」另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民國29年11月至30年10月的一年間，統帥部據

認為實際只有22個團參戰。劉鳳翰，前揭書，頁393～455。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日戰史（中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9月），頁596～626。

35 引自張玉法，前揭書，頁311。

36 詳閱陳存恭，〈中共在山西的戰爭目標與戰爭動員（1936～1945）〉，《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組論文集—軍事組織與戰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1年10月），頁181～241。

3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28。

38 同註37，頁122。

39 中共國防大學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1月第四次修訂再版），頁263～303。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頁98～140。

40 國史館藏，〈朱紹良電蔣中正隴東問題現正據行政院令頒防制異黨活動辦法並按照隴省實際情形再加整理統籌施行〉，《蔣中正總統文物》，民國28年4月20日，典藏號002090300216246；另見楊奎松，前揭書，頁410～411。

各戰區正式文電回報，國軍被中共擾亂襲擊者，即有395次之多。」⁴¹其中民國28年11～12月間，山西太原失守後，閻錫山試圖控制逐漸八路化的「新軍」，結果引發了晉西南新、舊兩軍武裝衝突，「新軍」在八路軍支援下突破包圍，並抵達佔據晉西北後，大部分被八路軍納編。⁴²另外在河北省省主席鹿鍾麟、民團總指揮張蔭梧也與中共八路軍互爭地盤，於民國28年4月雙方開始交火，並互相指控。⁴³由於國共摩擦衝突層出不窮，軍事委員會乃責由時任正、副參謀總長的何應欽、白崇禧與中共周恩來、葉劍英進行談判，雙方幾經交涉，政府於民國29年7月16日擬制了〈中央提示案〉，除劃定陝甘寧邊區與18集團軍與新四軍範圍與作戰地境外，並要求該兩軍於奉令1個月內，全部開到規定地區內，⁴⁴其中葉挺的「新四軍」一直到是年年底仍遲遲未遵令前往黃河以北地區，並襲擊自蘇南後撤之國軍第40師，第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並將叛軍降服解散、取消該軍番號，葉挺交軍法審判，此即抗戰期間有名的「新四軍事件」（中共稱皖南事

變）。⁴⁵到了民國32年5月22日莫斯科宣布解散「第三國際」，⁴⁶中共獲得國民政府意圖收復陝北地區，已令胡宗南3個集團軍完成準備的情報，並將其視為「第三次反共高潮」，除由朱德分別致電胡宗南與蔣委員長外，並發出〈發動宣傳反擊的通知〉，毛澤東還致電彭德懷指示軍事準備事宜，同時強調「除軍事準備外，極力進行政治動員……，並將此種宣傳傳播至西安重慶各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⁴⁷顯示中共除意圖透過外力牽制國民政府可能之軍事行動外，並造成美英蘇等國對國民政府的不信任。

二、實力消長與美國介入談判的結果

1943年11月底蔣委員長出席開羅會議，並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發表《開羅宣言》，公開宣告「戰後日本自甲午戰爭起侵占的臺灣、澎湖列嶼，以及東北四省等，均應歸還中國。」⁴⁸不僅確立戰後中國應有權益，也意味中國已位列世界強國，然而國民政府亮麗的外

41 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二)，頁462。

42 詳閱陳存恭，〈中共在山西的戰爭目標與戰爭動員(1936～1945)〉，頁181～24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日戰史（中卷）》，頁571～574。

43 郭廷以，前揭書（第四冊），頁104。張玉法，前揭書，頁315。楊奎松，前揭書，頁415。

44 〈中央提示案〉，民國29年7月16日；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二)，頁506～508。

45 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24～460。關中，前揭書，頁133～136。郭廷以，前揭書（第四冊），頁151～152；張海鵬，〈論『皖南事件』之善後〉，《抗戰勝利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印行，民國86年11月），頁111～131。

46 郭廷以，前揭書（第四冊），頁24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62～163。

47 〈朱總司令為呼籲團結、避免內戰致胡宗南、蔣介石等電〉，1943年7月4、6日；〈中央書記處關於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的通知〉，1943年7月8日；〈關於對付國民黨發動第3次反共高潮軍事準備問題的指示〉，1943年7月9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引自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頁68～73。

48 國史館藏，〈蔣中正羅斯福邱吉爾共同簽署之開羅宣言在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發表全文〉，《蔣中正總統文物》，民國43年12月3日，典藏號002060100183003。

交成績，卻無法抵銷日軍發動「一號作戰」中，所造成軍事、心理上的損失；⁴⁹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實力消退，即是其力量的增長，在歐洲戰場接近尾聲之際，美國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儘早結束戰爭，於是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銜命介入國共的談判調處。

(一)在國共實力消長方面

民國26年9月全面抗戰後，國共談判改編紅軍為3個師4萬5千人，到了民國34年「日本投降時，國軍的總兵力約4百萬人；共軍總兵力約130餘萬人（包括民兵）。」⁵⁰另根據中共官方公布資料指稱：「解放區總面積約95萬平方公里、人口9千9百50萬餘人，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上升到91萬、民兵220萬。」⁵¹8年之內共軍增加了86萬5千人；國共實力的消長情形，也可以從周恩來於民國33年10月10日，在延安慶祝雙十國慶大會上演說得到證明，周恩來先批評：「在歐洲戰場節節勝利的情況下，中國的正面戰場卻節節敗退，而敵後戰場是節節勝利，…」接著周恩來列舉說明指稱：「在最近半年內，截至9月為止，中國正面戰場淪陷了

10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我們敵後戰場卻從敵人手中收復了5萬公里的土地。正面戰場丟棄了4千多萬的人口，而敵後戰場又解放了4百多萬的人口。正面戰場失掉了102各城市，而敵後戰場又奪回了8個城市。正面戰場損失了幾十萬軍隊，而敵後戰場卻又擴大了10萬正規軍。」⁵²國共實力消長直接反應在中共的談判態度上。前於民國33年5月，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進行了多次會談，中共除要求政府承認16個軍47師，目前至少要給5軍16師番號（給付糧餉、補給），並要求政府承認「抗日根據地」政權的合法等20條內容。⁵³對於中共這種要脅的談判內容，當時參與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王世杰拒絕接受，惟中共仍態度強硬，張治中在給林伯渠的信件中說：「中央提示案對於去歲林彪師長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見已『大部容納』，……但先生依然強調『距離太遠』，可是距離太遠的原因，不外是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⁵⁴這種出爾反爾的談判方式，難以得出具體結果。

49 日本為消滅中國西南的空軍基地，摧毀中美空軍空襲日本的企圖，並藉以打通縱貫大陸鐵路，確保南洋方面軍和陸上交通，同時摧毀中國軍隊繼續抗戰的意圖，於民國33年4月下旬，發動代號「一號作戰」行動；國軍不僅人員犧牲慘重、影響民心士氣甚巨，也影響美軍對國民政府的觀感。參閱吳相湘，前揭書（下冊），頁981～1004。關中，前揭書，頁161。

50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頁468～469；另見〈蔣公從巔峰到谷底〉，《聯合報》，民國100年6月16日，版A13。有關抗戰後期共軍兵力數據，因統計時間點、正規軍或民兵身分認定分類不同，數據資料有落差。

51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73。

52 周恩來，〈如何解決〉；引自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年5月），頁769～78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頁597～598。

53 原「20條要求」後經協商改為12條，其他8條改以口頭提出。有關談判的過程與內容詳見〈張部長治中在國民參政會報告『關於中共問題商談經過』〉、〈中共代表林參政員祖涵在參政會報告關於中共問題商談經過〉，民國33年9月15日；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四)，頁261～268。關中，前揭書，頁144～159；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84～497。

54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2月第2次印刷），頁700。

(二)在美國介入談判方面

正當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之際，美國特使赫爾利於民國33年9月抵華，以排解糾紛見長的赫爾利開始介入國共談判，在為期一年的斡旋談判中，赫爾利除到延安會見毛澤東外，也進謁蔣委員長，並提出五點〈國共協議之基本條件建議〉，⁵⁵經協商毛澤東親自簽署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中共稱為「五條協定草案」），政府研議後，提出「國共協議之三項條件」，⁵⁶中共又提出「釋放政治犯、撤退包圍中共、廢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與停止所有特務活動」等4點覆談先決條件，而且又拒絕赫爾利提出國民政府派員到延安商談的建議，面對反覆無常的斡旋情形，赫爾利向羅斯福總統報告中說：「我們以克服了一切困難，但最後中共卻拒絕合作。」⁵⁷之後赫爾利雖然盡力促進雙方談判，但由於中共以「聯合政府」、「廢除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以及「特務、自由、放人、撤兵」做為談判先決條件等反覆要求，加上美國國務院部分駐華外交官傾共觀念與作

法，⁵⁸使赫爾利逐漸喪失調處的熱情，但戰後他還是促成了民國34年8～10月的國共重慶談判，而第2位受命來華調處國共衝突的代表是美國名將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也同樣是鎩羽而歸。⁵⁹可見政治戰場困難程度高於軍事戰場，尤其是面對複雜的國共關係，更非外國人所能體會理解。儘管中共實力持續增長，但國軍仍掌有軍事優勢，然而「自日本投降，至1946（民國35）年12月馬歇爾離華，16個月時間，國軍因受和談影響，未能主動尋求決戰（尤其是華東戰場），坐待共軍戰力成長（在東北完成50師組建），已失去速戰速決的戰略時機。」⁶⁰戰略上的錯誤，無法以戰術補救；而美國介入國共談判失敗與國民政府在戰後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政策的失誤，不僅讓大陸河山變色，也讓美軍在後來的韓國戰場上，付出慘痛的代價。

肆、「積極坐大」與「摩擦衝突」爭議評析

長期以來，中共無論是官方論述或抗

55 五點草案內容摘要：1.共同合作，求得國內軍隊之統一，期能迅速擊敗日本，並建設中國；2.中國共產黨之軍隊，應接受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命令；3.擁護孫中山之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4.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並使之為合法之政黨；5.中國政府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及一個軍隊。中共軍隊經中央政府編定後，將依其階級，享受與國軍相同之待遇，其各單位對軍火需求之分配，亦享受相等之待遇。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四)，頁289。

56 同註55，頁291、293～294。

57 引自關中，前揭書，頁183。

58 如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謝偉志(John S. Service)為代表的「戴謝集團」。有關該集團在華活動情形與影響，詳閱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編、黎明公司編輯部譯，《「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62年1月）。另參閱關中，前揭書，頁41～46。

59 馬歇爾於1946年12月離華，經過一年多的斡旋仍無法挽回國共內戰的悲劇。有關馬歇爾來華調處過程、國共爭議與結果等，在關中著《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第7～10章有詳實的論述與研析；另大陸學者楊奎松著《失去的機會？抗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與《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之第14章亦有論述。

60 郝柏村，前揭書，頁472。

日戰爭史著作，都說「1938（民國27）年10月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採取『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方針。」而國民政府則指稱中共抗戰開始就採取「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基本政策。⁶¹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國共鬥爭歷史環境下的論述，而全面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歷史事實是甚麼呢？其一是中共壯大了；其二是國共摩擦衝突迭有發生；其三是日本投降了、國共發生內戰，最後中共建政、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形成兩岸的分治對峙；前兩者要探究的是中共是怎麼壯大的？中共是以發展為主呢？抑或是以抗日為先？大敵當前，國共為什麼摩擦衝突？國共在抗日戰爭誰是民族禦侮的忠實執行者，誰是政黨階級利益的爭奪者。

一、積極坐大：獨立自主與敵後抗戰的機會

七七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在強敵進逼壓力下，以及中共信誓旦旦效忠宣言中，妥協原有「編共」立場，允許中共紅軍獨立編制，中共旋於8月22至25日的「洛川會議」中，討論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⁶²

(一)獨立自主發展

中共的發展是居於「抗日」需要？抑或是著眼「壯大」意圖？據相關研究指出，「洛川會議」前後對「獨立自主」雖取得共識，然究應採毛澤東主張「山地游擊戰」或周恩來、朱德主張的「運動游擊戰」，抑或林彪提出的「運動戰」則仍存有爭議，爭議的焦點是面對日軍攻擊要不要正面迎戰，以及如何迎戰等，⁶³最後會議並未通過毛澤東「山地游擊戰」的策略指導，而是毛以軍委主席身分，強行執行其避戰、不戰的策略。⁶⁴毛澤東甚至警告所屬「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⁶⁵可見毛澤東的「避戰」意圖，而敵後游擊戰一方面既可迴避敵人主力進攻，另一方面又可擴充實力；對此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歸納提出18條游擊戰好處，其中第2條「擴大我軍的根據地」、第4條「利於正面整軍」、第6條「最迅速最有效的擴大軍隊」、第7條「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第9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⁶⁶都是中共力圖藉抗戰擴黨、擴軍的鐵證。對於全面抗

61 此一說法是根據中共八路軍連支部書記李法卿脫離共黨後揭露指稱：「抗戰後，隨18集團軍出發，出發時毛澤東、朱德等曾召集訓話，大意謂『中日戰爭為本黨發展之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一），頁357～358。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編（延安時期）》（臺北：京漢文化，1988年），頁190。

6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15。

63 陳福榮、曾鹿平，〈洛川會議軍事分歧探析〉，《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6年10月，頁13～15。

64 陳存恭，〈毛澤東抗日策略：由『不打硬戰』到『抗而不戰』〉，《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3期一上冊》，民國86年12月，頁100～112。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頁142。

65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66年5月），頁387。

6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53。

戰後，中共擴大實力的圖謀，國民政府採取防範、取締措施，於是雙方摩擦、衝突也就難以避免；到了抗戰勝利前在民國34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開幕講話，充滿自豪的宣稱：「中共已擁有121萬黨員，9,550萬人口解放區，91萬的軍隊，220萬民兵，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這樣強大過。」⁶⁷問題是，日益強大的共軍，在長達八年抗戰中，中共宣稱「對日作戰12.5萬餘次」，然而中共領導的軍隊卻增長了20餘倍，中共以發展為主、抗戰為輔的策略至為明顯。

(二)敵後作戰機會

由於抗戰初期國民政府面對日本強大的軍事壓力，在應戰不暇情勢下，中共根據獨立自主的方針從事敵後發展，隨著抗日戰線持續擴大，日軍對於廣大的占領地區，只能採取點線局部控制的方式，使得敵後游擊空間大增，中共乃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散到日軍控制不到的農村、山地發展根據地，並建立政權、從事生產、武裝群眾，一方面藉以脫離國民政府控制，另一方面藉由襲擾日軍進行敵後抗敵愛國宣傳。民國28年開始，日軍雖對占領區實施「肅正作戰」，然對於潛藏民眾、行蹤飄忽的八路軍掃蕩效果有限。而國民政府留置或派遣敵後的游擊武力，由於整合不足、互不信任，且欠缺游擊作戰與群眾工作經驗，不僅難擋日軍的掃蕩，即使與共軍的摩擦亦經常吃虧。以冀察兩省為例，國軍於民國28年1月在敵後成立

冀察戰區，以鹿鍾麟為總司令，根據學者劉鳳翰研究「包括冀察二省及山東黃河以北地區，因將帥不合，各軍不互信，白晝遭受日偽軍進攻，夜晚防共軍有力的偷襲，至1940（民國29）年，鹿鍾麟、朱懷冰被劉伯承擊潰，冀察戰區已名存實亡，所轄之自衛軍、民軍、游擊隊，多自生自滅或投共降日。」⁶⁸相較於中共八路軍，抗戰初期在上海、太原淪陷後，八路軍即以山西為中心，分別推進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和晉西南，創建抗日根據地，策動山西「新軍」與兼併山東地方游擊武力，其宣稱「至1938（民國27）年10月，共作戰1,500餘次，殲滅日偽軍5萬餘人，繳獲各種槍1.2萬餘支，……。」⁶⁹而中共所稱偽軍，事實上部分是國軍的游擊武力。國軍敵後游擊武力成效不彰，除了日軍「掃蕩」與中共「摩擦」外，主要是戰術戰法錯誤，尤其「日軍多以打擊國軍根據地為目標，集中優勢兵力，由數方向採向心攻勢，而國軍游擊部隊之『反掃蕩』作戰，則分兵多方防禦，致損失慘重，根據地亦多數被日軍攻略。」⁷⁰加上游擊武力組成複雜，軍紀與擾民事件迭有發生，破壞了賴以生存的軍民關係（戰爭面），而國軍敵後游擊戰的弱點，恰好是中共八路軍的強點，尤其中共從「反圍剿」作戰經驗得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不僅讓日軍疲於奔命，也讓侷限正規作戰思維的國軍敵後游擊武力屢遭襲擊得逞。

6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3刷），頁1027～1028。

68 劉鳳翰，〈抗戰期間冀察兩省國共日為兵力的消長〉，前揭書，頁457。

6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日戰史（中卷）》，頁139。

70 蔣緯國主編，《國民革命戰史（三）—抗日禦侮（第七冊）》（臺北：黎明書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67年10月），頁238。

大陸學者楊奎松也認為：「抗戰期間中共游擊戰之成功，……除了中共戰略戰術運用成功之外，中共在敵後能夠與農民打成一片，取得其擁護和支持，至為關鍵。」⁷¹由此可見，敵後戰場的客觀環境，提供中共有利的發展空間，加上其擅長游擊戰與群眾工作的能力，讓中共在敵後戰場獲得發展機會。

二、摩擦衝突：違抗命令與反共高潮

從中共納編抗日談判中可知，無論是「共赴國難宣言」，抑或是「效忠宣示」都是建立在中共獨力自主發展的基礎之上，而國民政府雖力圖政令統一的主張，然隨著抗日戰線擴大與中共坐大發展，卻難以貫徹，使得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大部分處於摩擦的鬥爭之中。

(一)國民政府：中共違抗命令、破壞抗戰

根據1943年10月國民黨第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總報告》（以下簡稱《總報告》）臚列中共罪行包括：「第一、關於軍事：1.擅自擴軍，破壞軍政；2.不聽指揮，自由行動；3.煽動叛變，分化軍力；4.與敵平行行動，襲擊國軍。第二、關於政治：1.實行割據，擅立政權；2.慘殺人民，殘害政府官員。第三、關於經濟：1.私立銀行，擅發鈔票；2.種運鴉片，走私資敵。」⁷²另根據政府統計，抗戰期間中共襲擊國軍672次、竄襲地方

政府409次。⁷³儘管《總報告》或統計數據，對中共罪行指證歷歷，姑且不論事實與爭議，然從中共獨立自主發展的角度來看，所列之行為（罪行）乃是「革命事業」之所必需，即使是不義之舉，也被認為是「必要之惡」；⁷⁴換言之，中共早已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下的一員，而抗日戰爭只是提供其生存發展的過渡環境。這種體制外認知與國民政府「納共抗日」、統一政令的想法，雙方立場迥異。

(二)中共：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以「新四軍事件為例」

根據中共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進行了3次反共高潮，其中以第2次反共高潮之「新四軍事件」（以下簡稱《事件》）的影響最大。任何歷史事件發生必然有其因果關係，而摩擦、衝突事件也絕不是單方面問題，當中共抨擊國民政府以軍事手段處理「新四軍」時，卻無視於1938年12月共軍在河北大破張蔭梧、喬明禮保安部隊，使河北敵後國民政府游擊隊與民軍力量，幾乎完全被共軍收編；另民國28年9月山東地區國民政府敵後作戰部隊，也遭到共軍大規模收編；到了民國29年間共軍更擴大襲擊國軍，除迫使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退到山西外，並再度圍攻山東的孫良誠、高樹勳部。此外，在蘇北的「新四軍」在黃橋、曹甸襲

71 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敵後游擊戰〉，《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2期，2006年4月，頁1。

72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國防最高委員會為第五屆第十一次全體委員會通過對於『中國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總報告』之決議案〉，民國32年10月7日；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二)，頁13～26。

73 數據統計自〈有關共軍襲擊國軍併吞地方團隊之概要說明〉，民國64年6月，同註72，頁455～462。

74 例如民國29年10月據「中統局」查報，中共在山西、陝西、甘肅等西北地區種植鴉片，藉「庇種攬銷，包運暗售，更藉禁徵稅，強換物資，充作兵餉」。引自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三)，頁217～229。

擊國軍，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被俘、89軍軍長李守維殉職。當周恩來對「新四軍事件」死難的項英、被囚的葉挺發出「千古奇冤」的哀嘆之餘，⁷⁵是否也想過李守維軍長，以及更多在國共摩擦衝突中死難的國軍官兵呢？近十幾年來大陸學者對「新四軍事件」研究頗多，⁷⁶然無論是官方立場的宣教，抑或民間學者的觀點，大多以國民黨「反共高潮」論述之，甚至認為是國民黨為了報復共產黨「陰謀製造」的事件；事實上，國民政府擬頒的〈中央提示案〉是著眼於短期處理國共摩擦較佳方案，只是當時中共基於實力發展考量，對於國民政府解決摩擦爭議的態度心存僥倖。例如毛澤東於民國29年11月30日在給周恩來、項英的電報上說：「他（指蔣委員長）只有嚇人一法，對日本是嚇，對我們也是嚇，除了這個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籌莫展的。」⁷⁷另外在12月16日告訴劉少奇、陳毅、葉挺、項英又說：「雖說局部進攻是必然的，……依大局看，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⁷⁸從國民政府的立場來看，中共在「共赴國難宣言」第四點明白宣示「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如今統帥部僅只是調動一個軍級部隊，竟然要大動干戈，這已經不是軍令與紀律問題，而是明顯的軍

事叛變，調集部隊剿滅叛逆，本理所當然；然而中共在《事件》後，大舉製造國民政府殘殺同胞、發動內戰的國內外輿論壓力，讓國民政府在政治戰場上陷於被動因應，反觀中共在《事件》發生後，不僅獲得國、內外輿論的同情，並藉此斷絕與國民政府起碼的交涉管道，使國民政府力圖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想法更加困難。從《事件》發生前到結束後，可看出中共高明的政治操作。在《事件》發生前，毛澤東指導中共處理國共摩擦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並把「國民黨內部區分成頑固派、中間派與進步派，……才能利用他們的矛盾，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用極大的力量去團結國民黨中的中間派和進步派。」⁷⁹中共堅持獨立發展，甚至襲擊國軍、兼併地方武力，達成襲擊、兼併後即宣稱被襲擊的國軍或地方武力是反共頑固派、是漢奸、是偽軍，八路軍消滅他們是執行抗日戰爭。《事件》發生後，中共又以受害者姿態，發動國內外輿論撻伐國民政府意圖發動「內戰」。⁸⁰據當時中宣部長王世杰日記記載：「國際間對於新四軍事件，群以中國將發生大規模內戰為懼，且頗多受共產黨方面宣傳，而不直政府之處置者。」⁸¹美國羅斯

75 周恩來於1941（民國30）年1月19日在《新華日報》題辭「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

76 檢視「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自1994年至2011年間總共有267篇，以「皖南事變」為篇名之相關研究；若以關鍵字查詢，則出現1134篇與「皖南事變」相關文章。檢索日期：2011年8月23日。

77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1993年5月），頁586。

78 同註77，頁591。

7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749、750。

80 詳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頁497。

81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三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22。

福總統特致函蔣委員長「盼國共密切合作」。⁸²面對國內外輿論壓力，國民政府一方面將《事件》定調為「個別軍紀事件」；⁸³另一方面，透過各種管道向盟邦說明《事件》經過與政府抗戰決心。⁸⁴《事件》後雖沒有讓國共合作完全破裂，然而中共依然持續擴大實力、「新四軍」依然存在；⁸⁵中共甚至開始經營對美關係，使其從軍事實力擴充，朝外交影響力發展，而國民政府在抗日戰場持續面對悍敵進攻，⁸⁶對於中共問題也只能隱忍、妥協，畢竟抵禦外侮高於兄弟鬩牆。

三、爭議評析：民族利益與政黨利益的選擇

毛澤東在50、60年代曾多次對外表示「感謝日本的侵略」的話，其中民國45年在接見日本訪賓時曾說：「就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幹了件好

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⁸⁷另於民國53年毛澤東接見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代表又說：「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⁸⁸為避免影響華人社會的觀感，中共學者曾撰文探悉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表述的真實意義。⁸⁹然無論其真意為何，中共利用抗戰發展實力，是不爭的事實。曾有若干學者懷疑抗日期間中共「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展」策略來源的正確性。但美國研究中共統戰學者史萊克(Lyman P. Van Slyke)認為：「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確在執行這個策略。」⁹⁰史學大師黃仁宇教授從對外民族禦侮觀點指

82 郭廷以，前揭書（第四冊），頁156。

83 〈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為制裁新四軍叛變經過發表談話〉，民國30年1月17日。〈蔣委員長為新四軍事件發表『整飭軍暨加強抗戰』演講〉；見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二)，頁523～525、529～540。

84 例如〈蔣委員長在重慶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其說明解散新四軍之理由談話記錄〉，民國30年1月25日；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三編：戰時外交(二)，頁385～388。另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亦分別致電駐美大使胡適、駐蘇大使邵力子請向友邦說明：「解散新四軍經過級政府處置全為整飭軍紀，對政治與黨派問題絕無關係」，民國30年1月17日；見秦孝儀編，前揭書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二)，頁527、540。

85 1941（民國30）年1月20日中共自行發布命令覆編「新四軍」，並以陳毅為代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委、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並將全軍7個師、1個獨立旅。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77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150。

86 新四軍事件後，於民國30年3月在抗日戰場上進行了「上高會戰」、5月打「晉南會戰」，9、12月份「第二、三次長沙會戰」與「豫南會戰」又分別開打。

8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次印刷），頁460～461。

88 同註87，頁535。

89 李東朗，〈毛澤東關於日本侵略一個表述之真義〉，《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210～217。張振鵬，〈『感謝』就是感謝——『毛澤東說要感謝日本侵略』評議〉，《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2009年10月，頁123～125。

90 轉引自關中，前揭書，頁29～30。

出：「中國國民黨之領導抗戰，專注於民族主義，無從兼顧民生。中共則以民生為首務，寧可把抗日當作一種機會，而不以之為一種事業。」⁹¹日本學者片岡哲也(Tetsuya Kataoka)分析中共發展策略認為：「日本占領使國民黨失去城市的基礎，也為中共的鄉村包圍城是創造了機會。」⁹²由此可知，中共是以共產革命的觀點看待抗日戰爭，強調的是階級利益；而國民黨雖曾力圖制壓中共坐大，但身為執政黨終究必須承擔民族存亡歷史責任。然而，遺憾的是去（民國99）年7月中共召開「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要求與會歷史研究單位「要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⁹³同年9月3日中共《人民日報》社論，除提出「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抗擊外敵的第一聲號角」外，並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⁹⁴顯示中共為凝聚海內、外向心，試圖藉由歷史詮釋彰顯共產黨過去發展與現在、未來統治的正當性，不惜扭曲抗戰史實。馬英九總統在去（民國99）年「九三軍人節」慶祝大會講話中，除細數

國軍在對日抗戰第一線奮勇抗日的壯烈紀錄外，並以「歷史不容許被遺忘，更不容許竄改。……期勉國人認識歷史、維護歷史、保存歷史。」⁹⁵另於今（民國100）年7月在國防大學主辦的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再次提出「抗戰歷史實話實說」的呼籲。⁹⁶對日抗戰本質上是民族禦侮戰爭，而抗戰期間中共宣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政府提出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都是以民族利益為基礎的政策，不同的是中共以政策宣傳包裝實力發展，即使現在中共仍宣稱「領導抗戰」、「敵後戰場是抗日戰爭主戰場」、「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等說法，基本上仍是政黨利益的政治宣傳。

伍、結 語

西方學者彼德諾維克(Peter Novick)說：「真相只有一個，而非依視角而異。歷史都是被發現的，而非被製造出來的。儘管後續世代學者，隨著視角轉移會給過去的事件賦予不同的重要性，然而那些事件的意義是不變的。」⁹⁷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在全面抗戰的八年中，國軍與日軍

91 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解讀蔣介石日記》（臺北：時報文化，2003年9月2版9刷），頁217。

92 轉引自關中，前揭書，頁29。

93 〈胡錦濤、李長春會見黨史工作會與會代表，習近平、賀國強參加會見並出席會議：黨史研究要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統一〉，《新華每日電訊》，2010年7月22日。

94 〈銘記歷史、開創未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人民日報》，2010年9月3日，版1。

95 〈捍衛國家主權 永續發展民主繁榮—馬總統慶祝99年軍人節暨抗戰勝利65週年大會慶祝講話〉，《青年日報》，民國99年9月10日，版1。

96 〈國軍抗日鐵證如山，面對歷史還原真相：馬總統出席國防大學「慶祝建國100年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講話全文〉，《青年日報》，民國100年7月8日，版2。

97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Ideas in Context*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P.2.

進行會戰22次、大型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有3萬8千多次，其中英勇殉國的將領200多位、殉職官兵多達322萬餘人、民眾死亡據估計至少2千萬人，可說是史上最慘烈的一場民族聖戰。⁹⁸然而遺憾的是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撤離大陸、退守臺灣，臺海兩岸在意識形態、軍事對峙下，讓這段由蔣公領導中國國民黨與全國對日艱苦抗戰八年，乃至全面獲得勝利的史實，長期以來在臺海兩岸出現不同的版本。中共宣稱：「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軍隊，……抗擊了60%的侵華日軍和95%以上的偽軍，與日偽軍作戰12.5萬多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餘人（其中日軍52.7萬餘人），……取得抗日戰爭偉大勝利。」⁹⁹儘管抗日戰爭存在多元的歷史解釋，然而歷史事實終究只有一個，任何企圖利用歷史解釋爭功諉過終將失敗。抗日戰爭究竟是誰打的？美國學者易勞逸(Eastman E.Lloyd)教授曾指出：「為國民黨說一句公平話，它與一個在組織、訓練、裝備上佔絕對優勢的敵軍戰爭中，堅持了整整8年，與法國相比—法國對德國的抵抗僅僅6個星期便崩潰了；和英國相比—英國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物資支援。所以國民黨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蹟。……如果沒有內戰，如果戰後年代國民黨能成功的在大陸創建一個穩定的國家，現在的歷史學家將會把國民黨對日本侵略的抵抗作為一篇大無畏的英雄史詩來敘述。」¹⁰⁰這一段評論不僅肯定國民黨領導對日抗戰，也隱含對「成王敗寇」的反思與批判。

中共於民國95年製播的《大國崛起》(The Rise of the Great Nations)歷史記錄影集，在「帝國春秋—德國」有一段令人動容的報導（摘述）：「1970年冬剛接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Willy Brandt)，到訪波蘭在猶太紀念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視下，向二次世界大戰死難的猶太人下跪，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海峽兩岸都希望日本有一天也能出現像勃蘭特一樣有道德勇氣的首相；據此推思，我們更希望中共有一天能出現一位有道德勇氣的領導人，能夠真實面對抗戰史實，相信崛起的中共已有能力承擔歷史錯誤。

收件：100年09月14日

修正：100年10月27日

接受：100年11月08日

作者簡介

賴世上上校，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5年班；曾任排長、連、營輔導長、旅處長、教官、聯兵旅政戰主任；研究領域：文武關係、中共研究、政治作戰；現任職於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全民國防教育組主任教官。

98 同註94。

99 中共國防大學編，前揭書，頁484。

100 引自關中，前揭書，頁31～32。